

田园城市思想百余年中国之旅研究

Research on the Travel of Garden City Idea in China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郑国 林政政

ZHENG Guo, LIN Zhengyu

摘要：田园城市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思想之一，也是中国引入时间最早、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外来规划思想之一。本文利用萨义德的“理论的旅行”思想，基于中国的主体视角，分析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繁复历程和复杂影响。百余年来，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可被划分为20世纪初—1940年代的“误读和改造”、1950年代—1970年代的“批判与拒绝”和1980年代以来的“再读和再造”三个阶段。中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拒绝和改造主要源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城市发展的内在需要，在不同时期对其进行“量体裁衣”地改造和利用，最终将其内化为中国思想和实践的一部分。进入新时代，公园城市理念正在对田园城市思想进行改造并有望开启新的旅程。

Abstract: Garden City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urban planning idea in the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one of the earliest foreign planning ide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with deep influence. Using Said's traveling theo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su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 impacts of Garden City since entering China.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travel of Garden City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1) "misreading and remoulding"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1940s; (2) "criticism and rejectio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and (3) "re-reading and re-creation" after the 1980s. China's acceptance, rejection and remoulding of Garden City main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Garden City is remolded and utilized according to China's conditions, and finally internalized into a part of Chinese idea and practice. Entering the new era, Park City is hoping to replace Garden City with a new journey.

关键词：规划思想；理论的旅行；田园城市；公园城市；城市规划

Keywords: Planning Idea; Traveling Theory; Garden City; Park City; Urban Planning

思想的传播和交流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田园城市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思想之一^①，也是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影响最深的外来思想之一。该思想产生于西方社会矛盾和城乡问题最严峻的时代，是霍华德（E. Howard）针对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个“梦魇之城”提出的总体解决方案，其核心是社会改革，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城乡一体、土地公有、规模控制和自给自足^[1]。田园城市思想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产生了一批思想追随者和实践推动者。但在不同国家，由于思想文化背景和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各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理解和实践各不相同。本文系统分析这一思想进入中国的繁复历程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一方面为深入理解外来规划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另一方面为构建中国城市规划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启示。

1 分析思路：理论旅行

1982年，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后殖民理论代表人萨义德（E. W. Said）发表了《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指出思想^②在跨越族群、语境和时代传播时必然发生变化，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和批判性，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发挥新的用途^[2]。1994年，在《理论的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一文中，萨义德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思想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被重新解释，产生新的意义和更大的活力^[3]。这两篇文章不仅概括了萨义德的后殖民

作者：郑国，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sczhguo@163.com

林政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zhengyu.lin.18@alumni.ucl.ac.uk

① 田园城市也经常被视为一种城市规划理论。思想是一种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其作用在于指明前进的方向；理论是对现象进行演绎与推理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总结，其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未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与思想的特征更加吻合，因此本文称其为思想。

② 在萨义德的《理论的旅行》和《理论的旅行再思考》两篇文章中，“理论”和“思想”两个词通常同时出现或相互替代。为使文章更加简洁，本文统称其为“思想”。

理论，也为思想传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方法，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后殖民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通过经济手段持续提升国家地位的同时，也通过思想输出影响发展中国家，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殖民方式。由于它在表面上具有正义与和平的假象，因此通常不被人们所警觉。萨义德以旅行为隐喻，通过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来表达他对西方霸权的批评，主张思想的多元化和平等地位，呼吁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思想进行批判，进而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4]。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萨义德将思想传播比拟为旅行者的旅行过程，认为思想旅行大体上包含相似的三个或四个阶段：一是起点，即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初始内容；二是通道，即思想从发源地传播至目的地的路径和过程；三是目的地的接受或拒绝条件，即目的地对外来思想接受或抵制的情境；四是改造，即被接受的思想在目的地发生改变。前三个阶段是思想传播的必经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有可能发生^[2]。

笔者既参考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基本观点，也依托他提出的分析方法，以“理论旅行”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历程及其被接纳、拒绝或改造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1）虽然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它基于西方主体和局外人的视角，仍是站在西方看待东方，因此“只在墙上画了一扇门，而没有提供出去的路”。针对这一局限，本文以中国为主体，以局中人的视角分析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强调中国对它的接受、拒绝和改造；

（2）萨义德虽提及时间维度，但他更关注空间维度，也就是思想在不同国家间的共时性传播。由于在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中西方思想交流的时间差异远大于空间差异。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时间之旅，对其进入中国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进行历时性分析。百余年来，田园城市思想在中国的旅程可以被划分为具有明显差异的三个阶段，以下是它在各个阶段的不同旅程。

2 20世纪初—1940年代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田园城市思想起始于19世纪末，霍华德在总结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和乌托邦社区的经验教训后，提出通过社会改革解决城乡社会问题的设想。1898年，霍华德的《明

日——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form*）出版，但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1902年，他将书名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再版后引起了广泛重视。霍华德还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田园城市协会。1904年，伦敦郊区建成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1920年又建成了韦林（Welwyn）^[1]。田园城市思想诞生后，首先经日本和美国传入中国，开启了它的中国之旅。

2.1 通道

田园城市思想很快从英国传入美国并受到欢迎，霍华德也于1906年成立了美国田园城市协会。在美国，田园城市思想推动了郊区住宅区的发展，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梦”的重要内容，也催生了“邻里单位”“广亩城市”等城市规划思想和区域规划运动^[5]。田园城市思想随后传入日本，1907年日本内务省地方局翻译了《田园城市的理论与实践》（*Garden C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中的部分内容^①，并以“田园都市”为名出版，随后其他日本报刊也纷纷介绍田园城市思想和实践。日本还于1918年成立了“田园都市会社”（田园都市株式会社），1923年在东京郊区建成了日本第一个“田园都市”——田园调布（Den-en Chofu）。

日本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是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通道。1908年，刘石荪在《时报》上发表《田园都市制度》，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田园城市思想的文章。根据刘石荪的个人经历^②和“田园都市”这一译名，可以推知该文主要内容来自日本报刊。1909年，《吉林官报》也刊载了从日本翻译而来的《田园都市之理想》。1912年，《申报》的“译林”栏目刊登了译自日本的《贫民之住宅》，以日本的视角介绍了欧美的田园城市实践。1913年，《湖北省农会农报》和《云南实业杂志》都刊登了翻译自《日本农业世界》的《田园都市之元祖》，介绍了英国第一个田园城市莱奇沃思的基本情况。此后，中国还有多个报刊或著作发表了来自日本的与田园城市相关的文章。张维翰^③是这个通道上对田园城市介绍最为详尽者，他于1927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弓家七郎所著的《英国的田园市》，1930年又翻译出版了日本内务省地方局编写的《田园都市》，这两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实践，此后被其他文献广泛引用^[6]。

① 该书全名为 *Garden C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rinciples of a New Urban Planning*，作者是英国工程师森尼特（A. R. Sennett），于1905年在伦敦出版，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主要思想的诠释和对英美相关实践的介绍。日本内务省地方局主编的《田园都市》节选了其中一些具象化的内容和技术细节。

② 刘石荪，又名刘封建，辛亥革命后改名刘大同，是清末秀才，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曾跟随孙中山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③ 张维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市政专家，曾于1918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市政。1922年回国后任昆明首任市政公所督办，提出将昆明建设成为田园化的新都市。1922—1929年，张维翰三度赴日本考察日本市政改良和东京的市政建设。

美国是这一阶段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通道。这个通道上的第一篇文章是1913年《进步》杂志^①第1期刊登的、节译自美国一刊物文章的《英国模范村市之大概》一文；同年第5期刊登的《改良城市之理想》则介绍了田园城市的布局示意图，并将其作为理想城市的空间模型。孙科曾于1912—191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市政制度，他于1919年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都市规画论》，对田园城市有所涉及^[7]。1923年《东方杂志》刊登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陈莹撰写的《园城刍议》，文章评价了田园城市的优点，并为中国建设田园城市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方案^[8]。董修甲曾于1918—192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学习市政学，192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后收录于陆丹林编撰的《市政全书》中。

日本和美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中国对它的认识。在日本，田园城市思想刚被引入时仍处于以农业为主导的阶段，因此日本将该思想与乡村改良运动相结合，把Garden City中的Garden翻译成“田园”，强调乡村而弱化了城市社会改革的内容；同时，因日本多发地震，日本人将土地视为唯一可靠的私有财产，因此田园城市思想中的土地公有未被强调^[9]。美国对田园城市的理解更侧重于花园式郊区住宅区，因此将Garden City中的Garden理解为“花园”。因此，孙科也将田园城市解释为：“其目的在于大都会之外，建立新式村市，……村既建成，望之俨如一大公园，此‘花园都市’名义之所由来也”^[7]。同时由于美国奉行自由经济，土地公有也未被重视。综合而言，日本和美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认识均已与其原主旨相去甚远，思想的批判性隐退而建设性凸显。中国这一阶段所接受的是日本化和美国化的田园城市思想，而非霍华德的设想。

2.2 接受

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后，受到中国社会精英的普遍欢迎，这一阶段中国对其接受的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从19世纪后期起，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1915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大量西方思想纷纷进入中国，这为田园城市的中国之旅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是田园城市的字面意义与中国理想人居环境的相通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山水田园情结，讴歌自然、

赞美田园一直是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主题。时至近代，这种情结依然显明。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开设了“新年的梦想”栏目，刊登了142位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244个“梦想”，“田园生活”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10]。

“田园都市”和“花园城市”都符合中国文人对理想人居环境的想象，他们也通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进行阐释。刘石荪就是一个典型，他在《田园都市制度》中就将田园城市类比中国先秦的井田制：“殊不知此制度已见于我国上古时代，即中央为公田，八家皆司百亩同养公田，意义有无相同，存止相守，出入相司，疾病相救，无不视为同等此制度之起原”^[11]。

三是田园城市思想与中国时代需求的同构性。20世纪初期，美国市政改革和日本城市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受到世人青睐。面对当时城乡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城市对于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重要性，提出“建国必先建市”“打倒旧城郭，建设新都市”等主张，在引入田园城市的同时也普遍希望在中国推行这一思想，如董修甲在《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中指出“田园新市之制度，实亦我国当今之急务”^[12]。在这一时期全国主要城市的市政计划中，田园城市都是一个重要的理想模型。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为花园城市；1928年的《广州市施政计划书》、1929年的《首都计划》、1930的《大上海计划》以及武汉、杭州、汕头、西安等城市计划都以田园城市为建设目标^[13]。但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些规划并未真正实现，田园城市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规划师的憧憬中。

2.3 改造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后，救亡取代启蒙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防空和疏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新需求。田园城市思想也顺应这些需求而被改造——1934年，步陶在《拓荒》杂志上发表了《田园都市为今日救国之一方案》，从经济和战争两方面论证了建设田园城市的必要性^[14]；1937年，董修甲在《市政月刊》发表了《今后我国都市之建设与防空》，论述了田园城市的防空优势^[15]。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张国瑞，他于1939年在《闽政月刊》上发表了《战时田园城市》一文，于1940年出版了《战时田园市计划》一书，提出将桂林、南宁、重庆、西安、贵阳、昆明、成都等城市按照田园城市进行建设^[16]。1942年的《桂林市新市区建设计划》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张国瑞的设想，但因1944年日军进犯桂林而未能付诸实施。

① 《进步》杂志由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出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行，于1911年11月在上海创刊，创办目的是“以进步思想鼓动吾国人”，主要翻译欧美报刊的相关知识，1917年3月与《青年》杂志合并为《青年进步》。

2.4 小结

1908年,田园城市思想开始进入中国。截至1948年,各类报刊和著作共发表与田园城市相关的文章近百篇,田园城市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被介绍和讨论最多的外来城市规划思想。由于这些引介绝大多数转自日本和美国,缺少对霍华德原著的完整翻译,因此都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换言之,这一时期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误读”还伴随着想象,民国知识分子将中国城市当作病症,将想象的田园城市当作药方。田园城市思想在多个城市的市政计划中被采纳,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因防空的需求而被改造。这些规划几乎都未实施,对中国城市发展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启蒙意义较为突出。1948年是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思想的50周年,在这年6月6日的“中国工程师节”庆祝活动中,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认为,霍华德的思想“不啻也是一种大禹精神”^[17]。

3 1950年代—1970年代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3.1 通道

苏联是1950年代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学习对象,也是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

1911年,《明日的田园城市》被翻译成俄文。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这与霍华德思想中的社会改革和土地公有相契合,因此俄国被认为是最应推行田园城市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俄国也涌现了一批田园城市支持者,组建了田园城市协会,并曾针对莫斯科等城市制定过田园城市计划。但在1918—1922年的俄国国内战争中,规划专业机构和人才遭受严重损失,田园城市协会也被解散。尽管如此,田园城市依然是苏联早期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撑和探讨的热点话题^[18]。

1929—1931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展开了城市规划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在1931年6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莫斯科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作了题为“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专题报告,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号召摒弃外国的规划思想^[19]。在苏联城市规划行业及从业者看来,田园城市是典型的外国思想,被认为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是缺乏效率的,也未考虑到技术进步等因素,因此遭到批判和否定^[20]。

3.2 接受和拒绝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边。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运动。与之相对的是,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使得中美关系势同水火。朝鲜战争更使“反帝反美”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来自欧美的思想因此受到批判和否定。

在此背景下,中国接受了苏联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批判观点,摒弃了从欧美和日本引入的田园城市思想。例如:梁思成在这一时期对田园城市思想态度的转变极具代表性——他于1949年6月在《新华月报》发表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一文中对田园城市思想持肯定态度,“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21];但在他和林徽因1951年为《城市计划大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则表现出对田园城市的批判态度,“英美等国所沾沾自喜的一些‘新市镇’如伦敦的Wellwyn, Letchworth……,都只是些不太成功的逃避主题的支节尝试,只能满足比较少数财力宽裕的人的需要”^[22]。

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城市规划行业也开始反思和修正苏联模式,随后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事件使得城市规划学科和行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此后20年,中国大陆再未出现专门讨论田园城市思想的文章。书籍和报刊中凡是提及“田园城市”之处,普遍都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例如:在1961年出版的教科书《城乡规划》中,田园城市思想被作为分散主义的代表而遭到批判。“绿化祖国”和“大地园林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承担起满足国人田园情结的作用,也是共产主义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23]。只有我国台湾地区还延续了1950年代前对于田园城市思想的热情,并将其作为“台湾省政府驻地”中兴新村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田园城市思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遭受批评和冷落。在英国,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被收归国有,受田园城市思想影响推动的新城运动在1970年代进入尾声,城市建设重心向旧城改造转移,田园城市思想的影响力下降;在美国,霍华德及其田园城市思想受到雅各布斯等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认为霍华德是“反城市主义”“个人视角而不是城市视角”“家长作风”等,田园城市思想还被认为“助长了美国郊区蔓延而使得美国人深受其害”^[24];在欧洲大陆,“现代建筑运动的旗手”柯布西耶认为田园城市是前工业时代的幻想,是历史的倒退。在早期积极推行田园城市的日本、印度、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田园城市思想也因各种原因而

逐渐被抛弃或被边缘化^[25]。此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试图将田园城市思想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规划思想相关联,但其声音和影响力日渐式微。

4 1980年代以来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4.1 通道

改革开放以后,在其他国家已经式微的田园城市思想再次进入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一些学术刊物陆续刊登关于田园城市的文章。1998年是霍华德首次提出田园城市思想的100周年,国内城市规划领域的主要刊物都组织专栏介绍了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实践,再度兴起了田园城市研究热潮。各类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超过200篇,博硕士学位论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其中包括对霍华德思想及其原著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田园城市思想在各国实践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参与学者的类型和数量也更多,既有一批改革开放后赴欧美留学的归国学者,也有大量本土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经元翻译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本对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原文的翻译,对中国学者和规划师系统完整地理解田园城市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教科书为这一阶段田园城市思想优势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保证。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城市规划思想纷纷被引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也重新受到重视,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面临着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的竞争。教科书既是学科经典知识的集成,又与考试制度相关联。考试制度使得这些经典知识成为权威知识,最后内化为行业的常识。田园城市思想作为中国城市规划以及相关学科教科书的必备内容,在城市规划思想丛林和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在“关公战秦琼式”的思想讨论中占据优势地位。

4.2 接受

这一阶段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开放与包容的思想环境。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中国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开放、多元与包容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旋律,这为田园城市思想的再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二是现实的城乡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致使中国各种城市病日益凸显,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问题愈演愈烈。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落后和乡村衰退,“三农”问题成为新世纪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现实的城乡问题与田园城市思想诞生时的背景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三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

田园城市思想所强调的城乡一体、规模控制和自给自足的要求,与可持续发展观和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 consistency,因此在规划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受到广泛的接受:在规划理论方面,国内学者高度认同和热情赞赏田园城市思想,并将其与这一阶段广泛流行的“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园林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建立联系,把田园城市作为它们的重要思想源头或理论支撑;在规划实践方面,一些城市以田园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典型的如琼海、成都等提出的“现代田园城市”愿景。在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或新区规划中,田园城市也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规划方案的核心理念。

4.3 改造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思想文化和城市发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发展和脱贫攻坚,在生态环境建设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和国家新的奋斗目标与历史任务。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问题也得到显著改善,城市发展进入“以生活品质比高低、以市民满意定成败”的新阶段,提升城市品质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应“立足中国性,彰显世界性”,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

相比“田园”,“公园”更加强调公共性、人民性和人文性,一批与公园相关的空间概念迅速兴起,成为新时代国家空间治理的新载体。相比“田园城市”,“公园城市”更加彰显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以提升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目标。从2015年起,贵阳、江门、扬州等城市相继提出“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天府新区视察时,要求天府新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此后,公园城市成为更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成都也由“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转变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受此影响,“公园城市”逐渐取代“田园城市”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园城市延续了田园城市亲近自然、城乡一体和社会进步等思想,同时将中国传统的田园情结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融为一体,是对田园城市思想的再造^[26-27]。

4.4 小结

改革开放以后,田园城市思想再次进入中国并广受欢迎,成为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与它在其他国家

受到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引介和理解比第一阶段更加系统和全面，该思想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入。田园城市思想也契合了中国 21 世纪初期的城市发展需求，一度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或核心理念。进入新时代，随着城市发展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中国对田园城市思想进行了再造，提出了公园城市的新命题。

5 结语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待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其结论是不一样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以传教士的心态看待中国，他们以思想布道为宗旨，以同化和皈依为目标。本文基于中国的主体地位，从主体的视角分析了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和改造、拒绝、再接受和再造的过程（图 1）。从中可以看出，田园城市思想虽对中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是以“客随主变”为主导的。中国具有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对待外来思想的态度根本上取决于自身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对外来思想进行主动选择和改造，最终将其内化为中国思想和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在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继续立足于中国主体地位，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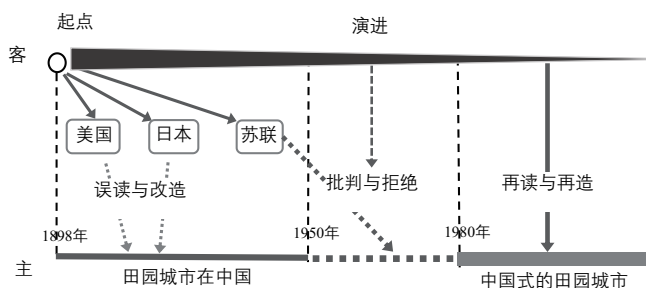


图 1 田园城市思想中国之旅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田园城市诞生于西方工业化背景下，是工业化时代最经典、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思想。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其融合了当时盛行的相关思想，回应了工业化时代城市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时建构了一种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想社会秩序，使人们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和按需所取。公园城市理念若要成为其后继者，应当在立足于中国式和人民性的基础之上，积极吸纳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效回应后工业化时期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以期成为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下可以进行解读的新经典，开启其世界之旅。UPI

参考文献

- [1] 埃比尼泽·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 [M]. 金经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 爱德华·萨义德. 世界·文本·批评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3] SAID E W.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J].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1994: 436-452.
- [4] 郭双林. 流动的思想: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J]. 史学月刊, 2019(6): 12-16.
- [5] TOTAFORTI S. The Garden C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J].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knowledge, 2020(1): 125-140.
- [6] 吕金程. 田园城市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变容研究: 文献数据库方法的应用 [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5.
- [7] 孙科. 都市规画论 [J]. 建设, 1919(5): 855-871.
- [8] 陈莹. 园城刍议 [J]. 东方杂志, 1923(22): 65-74.
- [9] OSHIMA K T. Denench ō fu: Building the Garden City in Japan[J].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6, 55(2): 140-151.
- [10] 王勇. 八十年前的“中国梦”——论 1933 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 [J]. 文艺争鸣, 2015(6): 95-101.
- [11] 刘石荪. 田园都市制度 [N]. 时报, 1908-03-06.
- [12] 董修甲. 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 [J]. 东方杂志, 1925(11): 30-45.
- [13] 色树芳. 近代国人对田园城市的认识 [J]. 民国档案, 2019(3): 73-83.
- [14] 步陶. 田园都市为今日救国之一方案 [J]. 拓荒, 1934(3): 79-81.
- [15] 董修甲. 今后我国都市之建设与防空 [J]. 大成期刊, 1937(6): 7-20.
- [16] 张国瑞. 战时田园市计划 [M]. 北京: 中国建设出版社, 1940.
- [17] 赵祖康. 城市与乡村融合的一个理想: 纪念五十年前之花园市倡议者霍华德 [J]. 市政评论, 1948(6): 2-3.
- [18] 凯瑟琳·库克. 社会主义城市: 1920 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 [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3(1): 213-240.
- [19] 许皓. 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 (1949—1965) [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8.
- [20] COOKE C. Russian responses to Garden City Idea[J]. Architectural review, 1978, 163(1): 353-363.
- [21] 梁思成. 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 [N]. 新华月报, 1949(11): 8-11.
- [22]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编译组. 城市计划大纲 [M]. 北京: 龙门联合书局, 1951: 3.
- [23] 侯丽. 亦城亦乡、非城非乡: 田园城市在中国的文化根源与现实启示 [M]// 支文军, 戴春. 当代语境下的田园城市.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
- [24]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第二版)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25] 刘亦师. 20 世纪上半叶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世界之展开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2): 109-118.
- [26] 石楠, 王波, 曲长虹, 等. 公园城市指数总体架构研究 [J]. 城市规划, 2022, 46(7): 7-11, 45.
- [27] 赵建军, 赵若玺, 李晓凤. 公园城市的理念解读与实践创新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33(5): 39-47.

(本文编辑: 顾春雪)